

Methodology and its I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方法论 与其制度含义

姚中秋 主编

◎ ◎ ◎

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
《理性的滥用与衰落研究》导论
哈耶克的英文

Annual of Chinese Studies on Austrian School
奥地利学派研究 第二辑 volume 2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奥地利学派研究

第二辑

方法论 与其制度含义

姚中秋 主编

Methodology and its I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学术委员会：

张曙光 高全喜 韦 森 朱宪辰

黄春兴 余赴礼 罗卫东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方法论与其制度含义 / 姚中秋主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 - 7 - 308 - 07048 - 5

I. 方… II. 姚… III. 奥地利学派 - 研究 -
文集 IV. F091. 34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5014 号

方法论与其制度含义

姚中秋 主编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楼伟珊

装帧设计 海云书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 × 960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66 千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8 - 07048 - 5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编辑说明

2008 年 8 月 22 至 23 日，华人哈耶克学会召开了第四届学术年会，主题为“中国 30 年改革的理论分析”。其中专门研究中国 30 年转型进程的论文，汇集为《中国转型的理论分析：奥地利学派的视角》一书出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则汇集了与会者提交的探究奥地利学派理论及相关主题的论文。

拿到这些论文，我感到非常喜悦，因为这些论文的作者大都是年轻学者，有多位是在读的博士生。他们或者是在导师影响下，或者自己探索，以奥地利学派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在经济学主流范式拥有支配权的当今，这是需要知识与道德上的勇气的。但我相信，他们的选择将会得到丰厚的回报。

当我们于 8 月份召开会议的时候，中国经济已显现减速的明显迹象。两个月后，情势大变。中国经济、社会似乎完成了一个从复苏、繁荣再到衰退的周期，相应地，社会结构、人们的精神状态似乎也经历了一个周期。如此急剧的转向，对经济学及相关联的其他学科，构成了一项重大的知识挑战：这个周期的内在机理是什么？

奥地利学派在这方面或许可以作出独特的贡献。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或许能够有效地解释本轮经济繁荣—衰退周期；奥地利学派关于市场规则—秩序的理论，或许有助于人们理解当下中国企业伦理、产业秩序乃至经济结构的扭曲；至于奥地

2 方法论与其制度含义

利学派的法律与政治理论，似乎也有助于人们准确地把握中国制度转型的现状与趋势。

可以说，理解当代中国，奥地利学派可以提供诸多资源。奥地利学派特有的关注时间、关注经济社会活动主体之主观创造性、关注动态过程、关于规则与制度的学术取向，对于理解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市场秩序、一个反复经历剧烈波动的经济体，应当具有特别的优势。

本书收录的论文在这方面作出了一些努力。这些论文主要讨论奥地利学派方法论问题和规则——秩序问题。这是奥地利学派研究的两大传统主题，而这两个主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正是其独特的方法论，推动奥地利学派提出并发展一种独特的关于制度设计与制度演化的理论。

不过，我始终认为，奥地利学派如果要有发展，尤其是在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就必须更多地面对现实世界，解释现实，同时在解释的过程中细化、深化理论。正是当年的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确立了现代奥地利学派的研究范式，而当下中国的转型过程，也为丰富奥地利学派理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以此与各位有志于发展奥地利学派、也渴望理解当下中国的同道共勉。

姚中秋

2008年11月

目 录

论 文

奥地利学派方法论展望	梁捷 / 1
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	黄雄 / 21
抽象规则与经济秩序	刘业进 / 52
哈耶克的两张脸：在建构理性与演化理性之间	李华芳 / 71
主体认知的传递、共享信念与制度	龚向虎 朱宪辰 / 86
贝叶斯理性、个体行动策略与道德 ——哈森义功利主义述评	赵亚奎 / 102
宪法—政府—市场：一个宪政经济学的新分析框架	王小卫 吴锦宇 / 125
没有约束的地方政府竞争	姚中秋 / 144

译 介

《理性的滥用与衰落研究》导论	布鲁斯·考德威尔 / 176
理性、规则遵循与情绪：道德偏好的经济学	Viktor J. Vanberg / 228
制度的形成与演化：门格尔和凡勃伦的互补性分析方法	Pierre Garrouste / 258

2 方法论与其制度含义

随 笔

哈耶克的英文

许章润 / 285

哈耶克在台湾

吴惠林 / 305

书 评

奥地利学派：时间与无知的经济学

——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

黄雄 / 314

奥地利学派方法论展望

梁捷*

摘 要：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日益陷入困境，很多学者对未来的经济学方法论提出设想。本文就在此基础上比较了奥地利学派与新古典学派方法论的异同，提出三个可能对未来经济学的发展有益的研究进路，指出奥地利学派和新古典学派在这些新的研究进路上分别可能作出的贡献。同时，我们重点讨论了奥地利学派的发展趋势，揭示奥地利学派内部存在的张力，通过剖析市场过程理论试图勾勒出奥地利学派或者经济学未来可能的方法论范式。

关键词：奥地利学派；方法论；米塞斯；市场过程；资本理论

引言

主流经济学发展到今天，还是遭遇到了方法论层面的困境。迈尔·科恩在2004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当前主流经济学陷于由萨缪尔森、希克斯等开创的“价值范式”和由科斯、诺斯、布坎南等开创的“交换范式”之间，迷失了方向。许多新兴学科都包含了

* 梁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0433），E-mail: xiaogan2008@gmail.com。本文主要思想曾与郑娟讨论，也感谢韦森老师的精心指导。

2 方法论与其制度含义

富有洞见的思想，可是它们如果没有认清经济学在“价值范式”和“交换范式”之间的斗争，就无法明确进一步的发展方向。^[1]

奥地利学派无疑包含了最丰富的方法论反思，有可能为未来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提供思想资源。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是由米塞斯奠定，即人类行动理论；由科兹纳扩展而成，即市场过程理论；而哈耶克对价格、知识和市场过程的理解，也在整个奥地利学派的框架中起到重要作用。

但同时，奥地利学派的两种重要思想：主观主义和企业家精神（市场过程）理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本文将主要讨论这几位思想家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方法论的思考及其在当下的价值，一方面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进行对话，另一方面也指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方法论的可能发展方向。

顺着科恩的思路，我们认为，以米塞斯为核心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方法论至少在三个层面，能够对未来经济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借鉴。第一个层面，米塞斯的方法论可以用于阐释以经济周期为代表的经济层面经验事实，能够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一种内在的叙事逻辑；第二个层面，米塞斯的方法论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人在与社会互动中的行动的理解；第三个层面，米塞斯方法论还可以应用于制度研究，从而拓展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视野。^[2]

在主观主义和企业家精神这两种不能相互兼容的理论之间，我们更偏向后一种理论进路，这也是科兹纳以及加里森（Roger Garrison）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主张的进路。我们要进一步发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话，还有两方面的工作有待完成。其一是继

[1] Meir Kohn, 2004, “Value and Exchange”, *Cato Journal*, 24 (3). 迈尔·科恩是一位以研究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出名的资深学者。他这篇论文发表后，在奥地利学派内部引起极大的反响，《奥地利经济学评论》出了专刊，邀请很多学者，评述了这篇论文的观点。

[2] 国内几乎没有专门研究米塞斯的专著或权威论文。最近的较为全面综述米塞斯思想的英文著作是：Peter J. Boettke and Peter Leeson (eds.), 2006, *The Legacy of Ludwig von Mises*, Aldershot: Edward Elgar, vol. 2。

续巩固奥地利学派的微观基础，借鉴吸收哈耶克思想（认识论和知识论）和行为经济学的进步，这同时也意味着重建奥地利学派宏观经济学，为其建设微观基础。其二则是重建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霍维茨（Steven Horwitz）在《微观基础与宏观经济学》（*Microfoundation and Macroeconomics*）中称之为“失去的联系”。至少哈耶克还认识到资本理论与宏观经济的关联，但是随着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兴起，资本理论与宏观经济的关联逐渐被人遗忘。

本文以下将分五节，分别讨论这几个问题。

一、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史研究的启示

先讨论第一个层面的问题。为什么要关注经验事实？为什么在新范式中应该加入“经济史”研究？

科恩的论文指出，主流经济学分裂为“价值范式”和“交换范式”，就是因为缺少能够容纳两种范式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科恩认为，经济史有可能起到这个统括的作用，为现在越来越狭隘的主流经济学理论研究指引方向。事实上，在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那里，经济学理论和经济经验事实的研究并没有两分，两者相互参照，浑然一体。从李嘉图开始，经济学理论逐渐明确了“价值范式”的取向，到新古典经济学那里才慢慢完善。而“交换范式”则是从反抗“价值范式”的非主流经济学中汲取营养，慢慢演化形成。现在要打破这两种范式的对立，就不妨回到它们最初分裂的地方。^[1]

[1] 这个问题早在百余年前就成为美国经济学界最热门的话题。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F. A. Fetter 组织讨论过这个主题的会议，他的论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F. A. Fetter, 1912, "The Definition of Pri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 (December), pp. 783 - 813. 后来 F. Knight 又把这个讨论带到了芝加哥，他的代表作是 1935 年的论文 "Value and Price"，收入其文集 *The Ethics of Competition*。

4 方法论与其制度含义

而奥地利学派学者一直注重经济史的研究。虽然门格尔等人反对德国历史学派缺乏理论的经济史研究，但并不单纯地反对经济史。事实上，门格尔晚年也一直从事经济史的研究工作。奥地利学派另一位著名学者熊彼特，曾经花费十年时间写作一本《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s*)，试图把经济理论、统计资料和历史研究融为一体。这部著作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但现如今，各种流派的新经济史发展了几十年后，纷纷陷入困境，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熊彼特综合性思考的可贵之处。

米塞斯曾多次强调，关于人类行动的科学有两个分支，一个是历史学，另一个是人类行动学，这两个不同的科学应该采取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可惜他将经济学和历史学进行严格区分的做法，很少被后来的研究者继承下来，因为历史学本身是个极为复杂的概念，很难简单地套用理论。但我们若是把米塞斯的方法论思考推广到某些历史性的范畴，特别是以商业周期为核心的经济史范畴，发现那些范畴确实可以有效运用米塞斯的思想，让他的分析方法发挥出最大威力。罗斯巴德堪称原教旨米塞斯主义者，坚决坚持米塞斯的范式。他向我们展示，米塞斯的方法论不仅具有抽象理论和整体理解经济过程的意义，还能用以评价经验事实。

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之间发生了一场大的争论，很多人对经济史研究中所分析数据的有效性与合法性产生了疑问。从此，经济史研究就陷入低潮，不复当年风光。直至今日，经济史的解释范式还是没能够被主流经济学吸收同化。事实上，这应该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经济史也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必须尊重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历史叙事中，大量非经济要素如思想、环境、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都会起到关键作用。早有史学家指出，历史叙事和逻辑叙事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叙事方式，不可调和，遑论经济史被经济学所吸收。即使有少数学者套用新古典经济模型来解释历史问题，也会由于缺乏“历史感”和“准确性”

的论述而受到历史学家的全面批评。但罗斯巴德认为，并非经济学无助于历史研究，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经济学理论罢了。

归根到底，虽然目前的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大多数历史事实，但事实上，这种理论框架是极不完备的，于是使经济史陷入了缺少理论分析、不能强有力地给出市场波动的动态逻辑并且对经验事实进行有效解释的境况。就经济史本身来说，目前最为主流的经济史范式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范式，用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意识形态等话语来描述整个历史的变迁。这套话语经过上百年的锤炼，具有一定的解释和预测能力。可是它有太多内在局限无法克服。而且，这套话语本身缺乏“历史感”，或者说它的基础是“非历史的”。

许多经济学家对此都有共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史是一种宏观的、长时段的、高度抽象的理论范式，它缺乏关于个人行动的微观基础和能够施以实证检验的微观结构。也就是说，市场和个人行为缺失了。如果我们关注马克思主义对制度的论述，并引入制度分析的工具，那又无法与马克思的宏观逻辑保持一致。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结构的很多论述，随着时间迁移也不再恰当。这几十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并没有取得有效的方法论的进展，这正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

经济史或者经济周期是一个动态过程，经济学家确实必须要把握住一些相对固定的结构。米塞斯的方法论中就暗含了这种思路，也就是认为从人的行动交往中可以慢慢固定下来一些稳定的结构，即一般意义上的制度。这就意味着，经济史研究本质上应是制度史或者制度变迁的研究。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家的方法论是不够完善的。1994年，经济史学家诺斯和福格尔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对经济史家是一种极大的鼓舞。诺斯采用制度分析的方法，特别注重历史中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结构、产权结构，以“制度变迁”的视角来阐释历史环境的变化。福格尔则主要使用计量经

6 方法论与其制度含义

济学的方法，验证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历史中的解释能力。有人把他们的工作合称为“新经济史学”，寄予厚望。可是十余年过去了，“新经济史学”没有很好的继承人，诺斯的研究兴趣也转向更深层次的制度分析，从而离狭义的经济史越来越远。相比之下，奥地利学派如米塞斯对市场交换以外的制度谈得很少。他认为其他制度都是边缘的制度，无论情况怎么复杂，最终必定会作用到核心的市场行为，会回归到消费者主权。所有的复杂制度，都可以回归到人的行为，我们只要牢牢地把握住这一根本点就足够了。^[1]

近些年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经济史家是斯坦福大学的格雷夫 (Avner Greif)，他用不同的研究手段表达了与米塞斯方法论接近的观点。格雷夫以一篇对意大利马格里布商人的研究享誉学界，他在学术上的最大特点是将博弈论和其他微观契约理论引入经济史的分析，从而获得比较严格的结论。这种博弈论经济史学与米塞斯的方法论立场是一致的，都是想通过历史中核心的市场波动来促进我们对市场本质和历史本质的理解，而不考虑过于抽象的文化、政治等广义制度要素。以博弈论为基础的契约理论正是经济学界的热门方向，格雷夫能找到这种角度，将它与历史制度分析结合起来，使人们似乎看到一丝经济史的未来希望。与米塞斯方法论相比，这种手段更为精巧，结论却不及米塞斯及罗斯巴德的工作那么具有普遍性。毕竟能够用博弈形式来表达的经济史结构只是非常有限的一部分，因而格雷夫的框架在开放性和普遍性上不如米塞斯。米塞斯从不拘泥于某项具体制度。他的兴趣是包含一切、普遍成立的一般意义的人类行动，而不需要具体市场结构的前提假设。很多历史学家早就对格雷夫这类要求特殊市场结构的微观经济史理论提出了毁灭性的批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1] 也就是说，以米塞斯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与旧、新制度经济学派有巨大的分歧，不可混淆。虽然基于个人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两者共同的批评对象，但前者的研究对象是“人类行动”，后者的研究对象是“制度”。

的当属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和法国年鉴学派过去一代的领袖布罗代尔。^[1]

和米塞斯一样，波兰尼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功能和人类理性的狭隘理解。波兰尼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大转型》一书中，就对经济学家将“市场结构”滥用到社会其他方面的做法提出反对意见。波兰尼认为经济运作必然要“嵌入”到社会之中，所以研究经济史的话，很忌讳单纯发掘历史中的“市场结构”而忽视其他结构，因为其他结构正是市场结构的支撑。布罗代尔则通过他自己的历史写作来批判经济学家所做的历史研究。布罗代尔认为日常的细节的行动，包含了最丰富的历史含义。他在马克思主义结构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长时段和短时段的历史解释，几部卷帙浩繁的作品都从不同的时段描绘历史细节，无所不包，力图真实地还原现代市场经济的发生过程。

将他们的工作与米塞斯方法论对照起来看，也很有意义。波兰尼和布罗代尔比诺斯、格雷夫等制度经济学家更重视一般的结构，如社会组织等，而不是狭隘的市场。而米塞斯并不想把微观的人类行动扩展到更广大的范畴，这一点上他不同于波兰尼或布罗代尔。米塞斯的方法论的核心并不关注制度本身，而是关注制度与人类行动的互动过程。而且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高度自治，更多或者更少地接受实践检验，都无法使它产生动摇。^[2]

波兰尼和布罗代尔这两位历史学家对主流经济学在历史中殖民行为的批判，都已经过去几十年。史学本身的主要趋势是在“后现代史学”和“现代史学”之间摇摆。史学家更多关注区域的、局部的、被压抑和隐藏的、非主流的历史叙述，而很少再有学

[1] 布罗代尔等人的这套思想，通过许宝强、渠敬东编的《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传入中国，影响颇大。

[2] 米塞斯本人极少做“历史学”的研究，可他的学生罗斯巴德做了大量属于这个范畴的研究。罗斯巴德坚持原教旨的米塞斯主义，完全采用先验逻辑，所以可以无视许多学者基于经验研究而对其理论进行的批判。

者有兴趣构建统一的框架来处理经济史问题。格雷夫这样的经济学家的努力，在某些问题上固然取得较为有力的说明，但总体上仍然无法摆脱波兰尼和布罗代尔的批判，故而很难为历史学家所认同。要构建一种既包含经济分析工具、又尊重历史叙述的框架，无论从经济学还是历史学的角度观察，暂时都还看不到希望。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米塞斯方法论的继承者罗斯巴德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美国大萧条》完全遵循米塞斯的方法，先验地勾勒出市场的逻辑，再以此来分析历史事实。在复杂的经济史中，因果性解释极为困难，但是市场运作的一般规律肯定成立。只有抓住市场的逻辑，对比市场成功和失败之处，才有可能比较深刻地认识历史。^[1]

总而言之，未来经济学范式的发展不能将经济史排除在外，而且用经济学框架来阐释历史并非没有可能，但能实现这一目的的经济框架应该是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经济学等更宽泛的一般经济学框架，以米塞斯为核心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正可以为此提供一种思考的角度。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米塞斯的人类行动学并不需要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只需要人能自由、健康、积极地参与社会行动和市场交换，我们就能通过逻辑演绎把握一系列的经济制度。这正是奥地利学派的优越之处。

二、奥地利学派对“人”的研究启示

目前主流微观经济学的拓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向，对应前面所说的米塞斯方法论对新古典经济学可能提供帮助的另两个层

[1] 不过，与弗里德曼、伯南克等货币主义学者相比，罗斯巴德过于忽视货币作用，所以他关于大萧条的阐述在学界一直很边缘，从未取得学界的普遍认同。

面。第一个方向是回到人本身，研究人的认知和决策过程；另一个方向是回到支撑市场作用的制度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方向必须相互结合，因为它们是认识人类行动的两个不同侧面。而这两个方向，都是新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所共同关注的。

在对人的理解方面，实验经济学最具代表性。实验经济学的实验表明，在不同认知情况和认知情绪的影响下，个人经常作出违背形式上最大化个人效用的选择，这类现象在实验室内和现实经济生活中都广泛存在，如著名的阿莱悖论和艾尔斯伯格悖论。

要克服这样的困难，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放弃最大化个人效用的原则，要么修改和扩展效用的概念。贝克尔的工作就是采取第二种方法。但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为了保证理论逻辑的一致性而对相对模糊的效用概念进行小修小补，并不能完全回避它所面临的困境。为了对人类行为的本质进行直接接触，我们只能放弃最大化个人效用的原则，通过理解人类决策的实质过程，重新制定人类行为规则。这正是米塞斯的方法论。

我们可以看到，米塞斯的方法论是以对人的行动的内在理解为核心。他并不鼓励深入研究人类认知的具体功能，而是希望把狭隘的认知功能通过人的行动与市场过程结合起来，在一个更宏观和更真实的层面上，从人的行动的角度来理解人。我们不能直接研究大脑行为，但可以直接研究大脑行为导致的人的行动，这才是经济学家的工作。哈耶克在这方面的后继工作最为重要，很好地发展了米塞斯方法论中所包含的思想萌芽。^[1]

哈耶克的知识论工作主要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完成，代表作

[1] 哈耶克于1953年出版了主要研究认知心理学的专著 *The Sensory Order*。有些学者如考德威尔认为这项研究为奥地利学派乃至整个经济学的创新开辟了新的方向。更多坚持奥地利学派思想的学者则认为这项研究已经偏离了奥地利学派的先验主旨，对奥地利学派意义不大。

有 1937 年的论文《经济学与知识》和 1945 年的论文《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1]

哈耶克这几篇文章的目的是要把自己对微观市场过程的理解，与日益强大的基于均衡分析的新古典经济学区分开来。在哈耶克看来，只有在市场所有行动者拥有局部知识、相互竞争的框架里才可能准确认识“均衡”。如果要把均衡与个人行动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必须要求所有行动者都在同一时点上作出最优选择。然而，终究有大量知识掌握在个人手里，因而无法实现这一目的。只要行动者的知识有可能改变，他就无法真正处于均衡状态之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从出生到死亡的心理演化史，每一个人的心理秩序都是这个人积极寻找发展机会并且适应环境不确定性的产物。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和偏好绝非天然给定或者基因遗传，必然是先天生物基因和后天文化基因共同演化的结果。所以人的认知并不单单是认知科学的问题，也应该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这个复杂的动态过程，直接影响到社会的一般均衡。

哈耶克认为知识即使有“可得性”，也完全不同于门格尔所要求的“客观性”，因为即使海量信息是客观的、可获得的，它们也无法保证得到及时有效处理。而迈克尔·波兰尼更进一步，区分“默会知识”和“显明知识”。“默会知识”不可能有“客观性”，也很难有“可得性”。只要有默会知识存在，人们就永远不可能掌握所有需要的知识。

在市场上，行动者根据价格做出反应，调节自己的行动。这种论述是奥地利学派与计划经济学者争论时采取的策略，它能与新古典的均衡理论相容，却逐渐违背了奥地利学派的另一点根本性思想：市场过程。市场过程理论并不反对行动者对价格的主动反应，但更强调人们市场中通过企业家精神来发现盈利机会。

[1] F. A. Hayek, 1937, "Economics and Knowledge", *Economica*, 4 (13): 33 - 54. F. A. Hayek, 1945,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5 (4): 519 - 530.